

無錫文史資料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主 编

第十九辑

目 次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回忆我的叔父孙治方..... | 薛禹言(1) |
| 回忆蒋经国先生二三事..... | 张一飞(10) |
| 抗战胜利后我在无锡参加的政治活动..... | 孙翔风(19) |
| “八·一三”抗战时我当了三个多月的驾驶兵..... | 吴盈福(39) |
| 汪精卫两次来锡视察“清乡”的经过..... | 许锡林(45) |
| | |
| 我与永泰丝厂及其它..... | 邹景衡(52) |
| 永泰丝厂在解放后的发展..... | 吕焕泰(67) |
| 永泰丝厂的智力投资情况..... | 金铸范(70) |
| 永泰系统各丝厂在抗战中所受损失的情况调查 (小资料)..... | (77) |
| 我所知道的豫康纱厂..... | 黄培昌口述 杨伯康整理(79) |
| 无锡县银行的始末..... | 吴邦周遗著(93) |
| 无锡县银行筹备情况简介..... | 冯晓钟(101) |
| 百年老店徐嘉和茶食店..... | |
| 选自《无锡糖烟酒行业志》初稿(103) | |
| 老字号邵祥泰煤铁号..... | 薛公量(112) |

- 解放前无锡教育行政机构的演变 周汉成 (125)
回忆母校江南大学 杨钧泰 (123)
- 近代无锡地区的时新小调 秦寿容 (128)
昔日荒坟滩 今天幸福村——记我市第一个居民新村
的兴建 沈本南 (154)

补白

- 锡山龙光洞石佛的来历 孙云年 (78)
南明史学者钱海岳 钱渭渔 (100)
无锡最早的眼科西医周复培 孙春圃 (102)
康有为替梅园“香海”去伪换真 胡子丹 (122)
解放前无锡的画像业 过朴白口述 过炳泉整理 (127)
西乡玉皇殿 伍一鸣 (153)

回忆我的叔父孙冶方

薛禹言

我的叔父，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，已离开我们有5年之久！回顾他那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，他在经济理论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，特别是他那参加革命后近60年的坎坷经历，常使我激动不已，思念万分！现在我根据与叔父接触和所见所闻的片断往事缕述如下，以表达我对叔父的怀念之情！

追求真理 离家出走

叔父出身在无锡县玉祁镇的一个小职员家庭。父亲薛华阁（即我的祖父），分别以“裁、培、林、果”四字命名他的四个儿子，小儿子取名萼果（即孙冶方）。我父薛明剑排行老二，故名萼培。祖父与画家吴观岱是莫逆之交，因吴氏无后，故有意叫叔父学画，并过继给吴氏。但叔父对绘画不感兴趣，所以他在1925年，就读荣巷公益工商中学时，便为追求革命真理而离家出走，决定只身赴苏联求学。当他到达海参崴后，才写信给我父亲，信中说：“如禀明双亲，恐阻碍远行，因此不辞而别。托兄代向父母善为解说。”他所以这样做也怕事后连累家庭。当时他化名“孙勉之”，后来他回到解放区时，又改名为“宋亮”。

智斗群魔 甩掉“尾巴”

1931年叔父回国不久，约定在上海四川路桥邮政总局门前，与地下党人碰头。不知是叛徒出卖？还是偶然的事情？那天英租界巡捕包围了邮政大楼，几十名嫌疑份子被捕，叔父亦在其中，而叔父仍十分镇静，自称是商人。后因无口供与物证，经人保释便恢复了自由，但他已在巡捕房中被关押了7天。抗日战争爆发前，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，与叔父的接触机会比较多。那时他在法租界蒲柏路租了一间小亭子间作居室，床上堆满了书，桌上也全是稿件。有一次他和我谈起在上海工作的安全问题，据他讲偶而也会发现有人“钉梢”，那就不能直接回家，必须连续调换电车和公共汽车，直到确信已甩掉“尾巴”为止。所以经常要调换住所。那时他还未结婚，星期天爱去“兰心剧场”看话剧。我和他通讯要寄到法租界的“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”。记得我为找叔父还闹过一次笑话：1936年秋季，学校刚开学，我穿了新发的毛料校服，晚饭后，一个人散步去研究会找叔父，那是一幢弄堂内的石库门房子，我用力敲了半天大门，只见灯光下人影浮动，但终无人应门，我就更用力的敲门，最后出来开门的一个人支吾其辞地讲，该会根本没有孙勉之这个人。我讲我写信都是寄到这里的，如果没有这人，怎样会给我回信的呢？僵持了半天，真是弄得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”。应门的人最后只好说：“可能有些《中国农村》的老读者，借我们这里作为通讯地点而已。”过了几天，叔父来学校找我，

责怪我那天晚上不应该到研究会去找他，害得那里的人忙碌了一番，因为平时他们自己人都是走隔壁人家的后门的。并嘱咐我以后不要去找他，他如星期天有空，会来约我的。

1941年初，叔父奉命取道重庆去延安工作，他和我婶母同行，曾住在重庆菜园坝复兴铁工厂（系荣德生自锡迁川的机器厂）内，白天足不出户。一天傍晚，他要我陪他到人迹稀少的地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我便和他到浮图关堆放木排的江滩上去散步，平时那里除了背纤的船夫外，没有闲人来往，谁知那天却遇到了一个在江边钓鱼的人，此人见到叔父后便上来搭讪，说他在浮图关（当时改名复兴关）中央训练团工作，并说过去和叔父在莫斯科天天碰头，反问叔父为何如此健忘？那时叔父面不改色从容应付，说自己是重庆申新四厂的职员，根本不知道什么科不科？对方纠缠多时，不得要领，终于狼狈而去。叔父回厂时嘱咐我在厂门口望风，他自己则迳入办公室，未敢返回宿舍。因工厂后面有山路可达两路口，便于脱险。直到夜色深沉后，他才回到家属宿舍，当时我婶母已焦急万分，埋怨不止。叔父却笑笑说：“今天碰到一个‘鬼’。”从此以后， he 除了晚上偶而上七星岗新华社日报社向周总理请示工作外，一般都做到足不出厂门，平时也很少有人来找他。最后他伪称盐业公司职员飞港返沪，转往新四军苏北根据地工作。

孜孜以求 老而弥坚

1949年春，叔父在丹阳华东第三野战军总部工作，筹划

接管上海工业的准备工作。那时他的全部家私只有书箱一只、铺盖一套、警卫员一人而已。解放以后他一直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。他老人家很早就是高级干部，婶母洪克平虽出身于慈溪银行家家庭，毕业于上海务本女校，早年投身革命，随同叔父去苏北工作时，曾担任过新四军军部托儿所所长等职务，后以中学教师离休于北京。但他家在上海、北京都是住单位家属宿舍，面积仅有一个小套罢了。直到1980年以后，他家才住进了北京复兴门外的高楼宿舍。

解放初期，叔父在上海担任华东工业部第一副部长，由于工作关系，回到故乡的机会较多，但除了工作，很少过问家事，就是他双亲的坟墓虽近在郊区肖家湾和东大池，也终生未往扫墓。他也从没有介绍过任何亲戚就业。叔父晚年有一次在黄公洞问我：“有没有人批评我六亲不认，不近人情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如能人人如此，国家才会强盛。”

叔父写文章虽很有名，但毛笔字却写得不够好。有一次母校连元街小学要他现场题字，他因很少题过字，弄得很难看。他虽知识渊博，并兼任过大学校长，但遇事却总是认真调查和虚心请教，从不摆架子、充权威。最近在整理遗著时发现了“孙冶方给钱学森的一封信”（见1984·7·30《人民日报》），在信中，他对经济学与技术革命的关系和发展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相沟通的问题，在廿多年前提出的见解，至今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他的亲属几乎全是搞技术工作的。他常讲：“科技人员要多读点马列主义、经济、

政治等书籍才能登高而望远；而搞经济的必须多读一些数学、理化书。我自己没有读过正规的高中，对高等数学、微积分等必要的基础知识很差。”叔父是我国社会科学学部委员，在东欧也享有盛誉，在英国被列入《世界名人词典》，但他虚怀若谷，实事求是。他在苏联6年当过俄语翻译，英语和日语也有一定的基础。到了古稀之年，却还孜孜不倦地背诵德语单词。听他讲，我国的《资本论》一书是从俄译本翻译过来的，故有不少辞不达意、不甚妥善的地方。他想仔细读通德文原版，纠正译得不妥之处，故拟先从学习德文着手，这种一丝不苟、脚踏实地的作风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
风狂雨暴见丹心

“文革”时，叔父因被诬为“特务”、“里通外国”、“反革命集团成员”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狱，和张闻天等4人首批在天安门前被游斗，后又押往天津斗批示众，并投入北京郊区秦城监狱的单人囚室，长达7年另5天。但入狱后，监狱当局就不再提什么“特务”、“二十八个半”等罪名，只要求他“悔过自新”，放弃“邪说”等，可以将功赎罪，官复原职。但是这个“中国经济领域中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”并没有在康生、陈伯达等一伙的威胁利诱下屈服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。1984年我去新疆五一农场探望女儿时，曾遇到该场子弟中学的英语教师任应文，他转业前刚好是秦城监狱204区的警卫班长。他讲叔父在狱中“不肯服罪”。自称是无辜误捕，总有一天会弄清真相，平反释放

的。并多次书面和口头提出《资本论》中有若干误译的地方，要求看守人员转达有关方面。在要他交待“罪行”时，他反而宣传他的一套“谬论”。有一次叔父囚室中的一只灯罩的螺丝松了，摇摇欲坠，他怕落下来打开了头，要求班长立即派人修理。叔父就是这样的“怕死”又不怕死。

叔父释放回家后不久，领导上补发了他的工资和发还了抄家物资。他就立即上缴了6000多元作为党费。这样的人怎么会叫人相信是反党集团的成员呢？！研究所中的同事有人说他是“老天真”，也有人说他是“书呆子”，他也从不计较。

1975年秋，叔父回到无锡休养，实际上是来写书的。太湖毕竟是他生长的地方，他爱故乡的一草一木，那次因为没有正式公务，所以可到处跑跑。他先后参观了玉祁、洛社、泰伯庙、县电化厂和县柴油机厂。他对两个县办企业的管理水平赞不绝口。他又在梅村农户中调查了几家实际收益，发现和报载新闻有些夸大。有一次他同家属七、八人去蠡园拍集体照，在那湖滨的草地上，几个小侄孙把香蕉皮和糖果纸到处乱抛，叔父却不嫌其烦地把瓜皮果壳一一从草地上拣起，放到废物箱中。并告诫小孩要保持公共场所的清洁卫生，并说我国的环境卫生要比欧洲、日本差。又有一天，我们在崇安寺等候公共汽车去锡惠公园，由于车少人多，叔父要让妇女、小孩和老人先上车，而不顾自己也已是年近古稀的老翁了，因此等了多时还上不了公共汽车，只得返回健康里临时寓所，直到第二天清早，在别人上班以前再搭车去了

惠山。他虽是无锡人，慕名宜兴两洞已久，一直没有机会去旅游。那次回锡休养，他以家属名义乘坐宜兴探矿机械厂的厂车前往，到达张渚后被该厂领导发现，才被招待到丁山宾馆居住。他当时所用照相机很讲究，是陪同毛主席接见日本朋友时，客人所赠。在“文革”期间，照相机被造反派抄家“借用”，弄得机件失灵，那次带来无锡时，才托在测绘仪器厂当钳工的侄孙，把它彻底修复的。

叔父没有子女，但在1947年收养了一个老战友的女儿。名叫李昭，合肥人，在十年动乱时间，有人借党的名义要她揭发叔父的“罪行”，她祇举出一条“爱听音乐”。她现在是成都部队医院的儿科医师，表现良好，不愧为老干部的好后代。

1982年3月，我去东北，顺道到北京医院探望叔父。那时他已从医院的病历卡上，得知自己身患肝癌扩散的绝症，在世的时日已屈指可数了，但在病床上还询问故乡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？玉祁人民公社人均收入有多少？等等。他还要我代约一个参军西藏退役回京不久的外孙到医院谈话，很想了解一下边疆的详情。又询问他在上海的二哥（我的父亲）的病情，其实我父亲已去世两年了，因他身患绝症，大家相约不以恶噩告诉他老人家以免刺激。他老兄弟俩，个性都很倔强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初期，由于立场、观点的不同，常常在理论上、看法上争论不休，直到叔父调到北京工作后才告停止。

叔父自知患了绝症以后，不谈自己的病情，却仍关心家乡、西藏和二哥的健康状况，岂是什么“六亲不认，不近人情”的人？医院的护理人员对叔父同病魔的拼搏精神十分钦佩，对他平易近人毫无架子、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深受感动。后来据主治医师讲，肝癌一经扩散，还能坚持工作，写书达3年之久可说是开创了肝癌史上的奇迹。1983年2月，在他弥留的最后一个星期，叔父自知不起，无法治疗，主动请求医院不必在他身上继续耗用药物，可移用于有治疗希望的病员，并写下了宝贵的“我的遗言”。

“我的遗言”很简单，他写道：“我死后，我的尸体交医院做医学解剖，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，不留骨灰，不开追悼会。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，对我的经济学观点，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评会。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，希望广为宣传，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，以至错误的观点，也希望不客气的加以批判，以免贻误社会。”

叔父的骨灰一半撒在无锡三山公园外侧的太湖中，另一半撒在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中。采用庄严的进行曲而不是用哀乐举行了葬礼。“心底无私天地宽”，在叔父的遗言中，使我们看到了他那忘我的高尚境界，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。

由于不举行追悼会，我们准备了但没有寄出的挽联，联曰：“赤胆为人民，念念不忘筹四化；红心报党国，谆谆教导育英华。”老所长虽然已离开了人间，但经他教育培养出

来的年青学者已茁壮成长，正为祖国的四化宏图出谋划策，作为经济改革的尖兵而遍布祖国。后来遵照叔父的遗言，“孙冶方经济理论讨论会”于1983年9月16日在无锡市华晶宾馆举行，出席讨论会的有27个省市的学者、专家170多人，开创了思想理论学术界的新风。类似的活动，早在北京、上海等地举办，他最亲密的战友徐雪寒等也在1984年12期的《财贸经济》上著文指出了叔父在经济理论上的不足之处。并由三十年代的老战友薛暮桥等55人发起成立了“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会”，集款人民币20万元，其中叔父的家属遵照遗言献出稿费2万元。

首届发奖会于1985年5月22日在京举行，获奖的是全国各单位推荐的四本经济学著作和47篇经济学论文。今后将每隔两年评选一次，实现了叔父的遗愿，以鼓舞后人创造性地研究经济理论。



回忆蒋经国先生二三事

张一飞

(一)

抗战时，我在江西省卫生人员训练所任教务主任时，听到关于蒋经国先生的不少传闻。据说在大革命前，蒋经国去苏联留学时，他还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。他到莫斯科进中山大学学习，后又转入步兵骑兵学校。国共分裂时，蒋经国写了《反对人民公敌蒋介石》一文登载在《真理报》上，谴责蒋介石叛变革命，声明从此断绝父子关系。据说蒋经国有一次在渡船上遇到苏联大文豪高尔基，高尔基发现他是中国人，与他谈话，才知道他是蒋介石的儿子。后来高尔基汇报了斯大林，那时他已加入了共产党，在煤矿做组织工作，并同苏联女子技术学校毕业生结了婚（回国后改名为蒋方良）。抗战爆发后，我驻苏大使蒋廷黻与斯大林交涉，要求让蒋经国回国参加抗战。蒋经国回到重庆时，蒋介石事先并不知道，是由宋美龄作了巧妙的安排后才使父子见了面。当时，蒋介石要他好好学习，多读点书。后来我在赣州曾去蒋经国的图书室，内藏书籍，全系蒋介石给他的。我曾在崇义县长沈知方处借到一本《拿

破仑传》，书上有蒋介石读后感的许多红杠，我还记得上面批有“英雄本色”等字句，并加了不少眉批、摘要。据说蒋介石对儿子管教颇严，蒋经国到江西后担任赣州专员，有两次写信给他父亲，因字迹潦草，被原信退回，责令用正楷缮写后再给他寄去。当时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（字天翼）很会投机，故得到蒋介石的信任。有一次熊到重庆，打听到蒋介石正在读《易经》，就向对《易经》有研究的专家、学者请教，把要点和心得牢记在心。当谒见蒋介石时，蒋问他最近在学习什么？他说正在学习《易经》。蒋想他学的与自己相同，故内心很高兴，便进一步问他有什么学习心得，熊式辉当即讲得头头是道，蒋觉得他学得深透，足为人师，就对熊说：“经国回来了，到你那里去学做些工作，怎么样？”熊式辉感到很为难，不知给他做什么工作才好。就对蒋说：“让他当民政厅长吧？”蒋说：“不行，他还没有这个水平。”熊又说：“当保安司令呢？”蒋又表示不行，熊说：“专员呢？”蒋说：“还太高。”熊说：“当县长吧！”蒋说：“那还差不多。”熊式辉为了迎合蒋介石，便任命蒋经国为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县县长。蒋经国刚到江西时，曾担任过保安司令部督练处处长。那时省会还在南昌，晚上他常穿青布衣服，在大街小巷走动。有一次他听到在一座房子里传出打麻将的声音，他就敲门进去。这正是某厅长的公馆，里面太太小姐一屋子人正在叉麻将，他一进门就拿出捐款簿请各人认捐说：“我叫蒋经国，现在前线吃紧，你们却

逍遥自在地又麻将。国家号召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少了不行，至少一千元以上”。这件事曾轰动了江西。

(二)

蒋经国到赣州任专员兼县长时，规定所有公务员一律称呼公仆，穿青布中山装，戴黑牛皮平顶帽。

蒋经国曾写过一本《冰天雪地》的小册子，在赣南时曾编号分发给大家阅读，他在小册子里叙述：有一次在苏联的冰天雪地里开火车，车到站后，他下车打开水，一壶开水提到火车头上时已变成了一块冰。后来我曾几次听到他亲口说过：“增强抵抗力要靠锻炼，比如我到赣南以后，衣服比在苏联穿得多，那里天气寒冷，衣服反倒没有现在穿得多。”

他在赣南工作时，下班后，经常穿了青布中山装到农村去了解情况。有一次，他看见一个衣着破烂的老太，呼天喊地在场头抱头痛哭，他走上去问：“老表嫂！（江西人称男的叫老表，称女的叫表嫂）什么事这么伤心？”老太见是一个不相识的普通年青人，不理不睬，只是大哭不已。他在旁边站了一会，再问老太，老太说：“老表！告诉你也没有用。我是个孤苦的穷老太婆，要依靠独子生活，谁知昨天半夜我的儿子却被乡公所抓去当壮丁了！”蒋说：“你儿子是独子，按规定不征兵的，一定是他们搞错了。不要急，你明天烧好晚饭，等儿子回来吃吧！”老太看了他一眼，只当他瞎

吹牛。第二天晚饭刚烧好，儿子果然回来了。儿子听娘说，她遇到的人个子不高，不禁喊道：“这人一定是蒋专员！”老太连声叨念：“真是青天大老爷！”原来蒋经国发现这事后，即命军事科查明，如系独子，立即放回。从此这件事就在民间传开了。

还有一次蒋经国在赣州骑自行车，不留心撞了一个军官，这人见他身着青布衣服，年纪轻轻的，像个平民百姓，上前就是几个耳光。蒋质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打人？！”那军人自恃身为师长，反唇相讥：“打了你，怎么样？”两个卫士用枪对准那个军人说：“这是我们的蒋专员！”事后蒋将此事经过电告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，顾亲自赶来将那位师长禁闭了一星期。老百姓听到师长打人受处分，无不拍手称快，传颂一时。

(三)

1940年，我因卫生人员训练所有人事纠纷，不愿干下去。是年夏天，适逢江西省政府招考各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教育长(级别荐任)，规定报考者要大专以上毕业，或有两年县级科长以上证明。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报考，结果被录取了。我在江西省训练团泰和特训班受训两个月。因我是外省人，在江西没有人事关系，结业后被分配到赣南第四行政区崇义县，任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教育长。崇义县是个偏僻小县，陆路不

通汽车，水路不通轮船，出入全靠两条腿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新赣南建设计划草案，原本是蒋介石亲自审阅的，我看到原本是连史纸毛笔正楷誊写的，上面批有“可行”、“缓行”、“不适用”等字样。新赣南建设目标是：人人有饭吃，人人有衣穿，人人有居住，人人有工做，人人有书读，人人有路走。规定县县设中学，保保办小学。祠堂庙宇收归公有，兴办教育。所有这些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，乡绅们纷纷向重庆告状，说蒋经国学苏联共产党的一套，不保护私有财产，社会上议论纷纷。他还制定《新赣南家训》，内容是：“东方发白，大家起床。洗脸刷牙，打扫厅房，内外清洁，整齐大方。天天运动，身体健康……户户养鸡鸭，家家畜牛羊。”约有一千字，规定每人背熟，家家要执行。其内容不过是融合朱子家训、古代格言及当时社会形势编写的。当时在赣州还办了《正气日报》、正气中学。在距城六、七里的虎岗建立了儿童新村，几百米地段，从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，还准备一直办到大学。每逢寒暑假，蒋经国还亲自在虎岗搞些夏令营、冬令营之类的活动。我参加过一次冬令营，营长蒋经国，大队长蒋纬国，我被点名当指导员。冬令营每天早晨升旗要唱虎岗谣。歌词曰：太阳出来照虎岗，岗上儿童脸发光，齐声作长啸，好象老虎叫。一叫再叫，魔鬼影全消，新的时代来到了。

当时赣南社会上烟赌娼已绝迹，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曾一度出现了新气象。